

文化名人坊

楼适夷与傅雷：

一段友谊的缔结、破裂与再续

2025年，是作家、翻译家、出版家楼适夷(1905年-2001年)先生诞辰120周年。

楼适夷与傅雷的友谊，向为人津津乐道。最著名的例子当是1980年代初，楼适夷促成《傅雷家书》的出版，并撰文(“代序”)向世人推荐。另如1954年傅雷应楼适夷之请，将其巴尔扎克译作的所有版权转交人民文学出版社；1958年11月5日傅雷填写的履历表中，“社会关系”一栏填了两个人，上海二人(朱人秀、周煦良)，北京一人，即为楼适夷，均足以揭示二人感情之深。

但罕有人提到的是，楼适夷与傅雷的友谊，进入1960年代之后产生过较为严重的危机，以至于几同破裂。在傅雷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楼适夷都未能谅解傅雷的固执己见，甚至认为其结局不值得同情。然而此后，楼适夷追念旧谊，又写出多篇深情回忆傅雷的文章，促成《傅雷家书》出版，并积极参加悼念活动，可谓在某种意义上再续了此前的友谊。

“我们竟然一见如故”

友谊之缔结

楼适夷与傅雷，经历、思想和性情都大不相同，所以他们成为好友，是一件不寻常的事。楼适夷小学毕业后先到钱庄工作，后参加革命，以社会为大学，文化素养主要靠的是自修。1930年他赴日一年半，也未进大学接受专业教育。傅雷则在巴黎大学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，并到西洋多国参观游历过，见多识广，于文学、艺术均深有造诣，眼界极高。其性情，更是出了名的刚烈、孤傲、耿直。照常理，楼适夷较难亲近傅雷，傅雷也不易接纳楼适夷。楼适夷在1979年所写的《痛悼傅雷》中说：“像我这样一个流浪文人，进入他的客厅，可能是有些格格不入的，但出乎意外，我们竟然一见如故，马上互相吸引，推心置腹地畅谈开来。”那么，为何二人能一见如故呢？

1940年9月，楼适夷与老乡兼好友袁桂常筹办的《大陆》月刊创刊。为扩大作者圈，通过袁桂常介绍，楼适夷结识了傅雷——袁桂常夫人画家顾飞的表哥。二人之所以能够迅速缔结友谊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都正失意：楼适夷与党组织的关系自1937年出狱后一直未能恢复，数年来辗转多地，事业与生活也未能安顿下来，郁郁不得志；而傅雷此时因日寇入侵，并受此前工作与情感不顺的影响，正闭门谢客、专心译书，也颇为孤寂。楼适夷长期做团组织与报刊编辑工作，常与不同类型的人打交道，性格包容性相对较强。而傅雷，大概也能欣赏楼适夷身上与他相似的率真和坦诚。待家人迁往余姚后，楼适夷在上海没有了固定居所，往往不住叔父家中，就住傅雷家中。

楼适夷1943年6月23日至8月10日的日记，由其编为《逸庐日课第一册》，题名《工作·生活·情绪》。在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日记里，多次出现与傅雷相关的记录。比如7月18日下午他到傅雷家，日记中写道：“每次到叔家，便如回家一般舒泰，而到傅家则心神愉快。”7月19日的日记，评价傅雷对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——“傅雷真肯译出，倒是一件盛事”。8月1日，“六时往傅家。在他家洗了一个浴。上天下地谈到晚上十一时半，才回寓。”8月6日，“到傅家去，谈到十一点钟回来。”7日晚上，又到傅家洗浴，谈到十点多。8日下午去傅家吃桃，傍晚与傅雷逛旧书店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一年后的夏天，傅雷还掩护遭日本宪兵通缉的楼适夷在家中居住了约一个月。

但并不是每次到傅雷家都“心神愉快”。楼适夷对傅雷堪称严格的子女教育理念并不太赞同。在《痛悼傅雷》中，他回忆了一次干涉傅雷体罚傅聪的经历：“我亲眼看见他抓住孩子的头发，提着脑袋往墙上撞，好像立时三刻要把孩子处死的神情，母亲在旁边两手发抖，不敢上前营救，我只好实行干涉内政，把孩子从他的手里抢了出来。”傅雷在被楼适夷制止后哭了出来，讲述了童年受母亲严格教育的经历。楼适夷在文中对傅雷批评道：“莫非他以为自己的成就全来自母亲的暴力，因此也同样地去对待自己的孩子吗？他却忘记了自己是怎样反抗他的母亲的，他是完全违背母亲的意志，把母亲丢在家里，一个人偷偷溜出家门跟亲戚去法国去学习的。一直到老母临死之前，才在母子间取得了和解。后来，儿子傅聪对他的反抗，也是极为可怕的，这对傅雷晚年的生活是极沉重的打击。”应该说，即便不谈政治，二人理念的分歧在此时也已经显现。

为何要购买较多毛笔

友谊之破裂

1944年底，楼适夷来到四明山抗日根据地，重返革命队伍。1946年初，他回到上海，与傅雷恢复了联系。此时的傅雷，政治热情也高涨了起来。1947年，他因呼吁正视苏联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侵害，而引起左翼文人猛烈批判。在此过程中，楼适夷受友人委托，去做傅雷的思想工作。但每次都“面红耳赤”，不欢而散。钱锺书劝告楼适夷，傅雷可能患有肺结核，经常低烧，应避免使其

激动。此后他便不再与傅雷交谈敏感话题，见面次数也少了起来。1947年底楼适夷离开上海后，二人连通信也很少了。

1949年12月，傅雷辗转来到北京，见到了楼适夷。他们谈了什么已不可知，但傅雷通过此行，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对新政权的疑虑，所以与楼适夷的友谊，也便自然恢复了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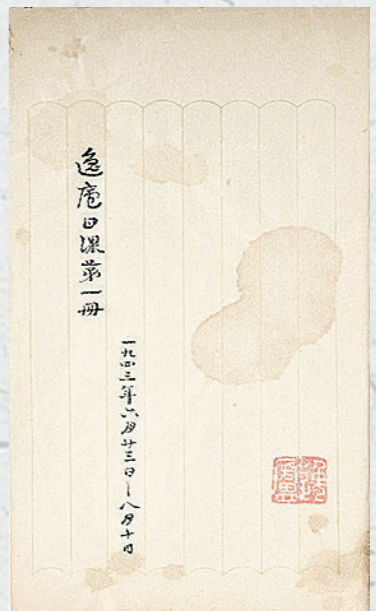
1952年9月，楼适夷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副总编辑。不久，他便致函傅雷，请他将在平明出版社的巴尔扎克译稿版权转交人文社。次年10月，楼适夷到上海出差，又与傅雷面商此事。傅雷原则上答应移交，并允诺为人文社继续翻译巴尔扎克作品。1954年7月8日，傅雷在致宋淇的信中说：“巴尔扎克几部都移给‘人文’去了，因楼适夷在那边当社长兼副总编辑，跟我说了二年多，不好意思推却故人情意。”可见，傅雷之所以答应楼适夷，是因为将他视作有“情意”的老友。

1955年傅雷出任上海市政协委员，参与新中国建设的热情日渐高涨。1957年5月，他加入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书记处，也加入时代的大合唱。但到了8月，形势急转直下，他开始遭到严厉批判。年底朱梅馥在给傅雷的信中说：“作协批判爸爸的会，一共开了十次，前后作了三次检讨……多少有些难受，神经也紧张，人也瘦了许多，常常失眠，掉了七磅。”

就在此前不久，他与楼适夷有过几次亲密接触。1957年3月，傅雷赴京参加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，与楼适夷多次深入交流。4月初，楼适夷返乡途经上海。傅雷要他住在家中。晚上联床夜话，傅雷谈起在海外学习的傅聪，并拿出与傅聪的通信让楼适夷看，给楼适夷留下深刻印象。楼适夷提议一起去富春江游玩，傅雷应允。但很快，他便因工作繁忙而解除了约定。5月中旬，楼适夷回上海后继续住傅雷家中。朱梅馥在25日写给傅雷的信中说：“楼伯伯很高兴，住在我们家最随便而不拘束。”

1958年4月30日，傅雷被划为“右派”。此后心情低落，以研究碑帖和书法来排遣苦闷。1961年2月11日，楼适夷收到傅雷来信。信中，傅雷托他多代购一些戴月轩的仿朝韩小楷毛笔，一二十支也“不嫌多”。楼适夷对傅雷的举动很不赞同，在日记中表示，不知该如何回复，因为很想规劝傅雷不钻牛角尖、走出小世界，但感觉无能为力。复信不久还是写了出来，其内容据傅雷回信可大致推知：楼适夷批评买太多毛笔是“抢购囤积”，“钻研书法原非坏事”，但脱离了现实，劝傅雷“今年做一最重要的计划”，集中精力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，跟上时代。如此一本正经的劝诫，引发傅雷的极大不满。于是，他在24日写出一封近乎绝交的复信。信中，傅雷解释了为何要购买较多毛笔，批驳楼适夷武断地凭想象下结论。针对楼适夷指责其脱离现实，傅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：“倘鄙人还可抬起头来向老友提一点意见的话，希望阁下脱产学习之时万勿脱离实际；特别要经过一番调查研究，庶可认清对象，对症下药。”信末则云：“阁下既以原则性相绳，又正辞严，故弟亦不揣冒昧，敢以原则论列。”26日，楼适夷收到复信，在日记中表示，傅雷的“唯我主义”依然十分顽强，改造的希望渺茫。在傅雷陷入低谷时，楼适夷不但对他缺乏同情，反以原则性加要求，这无异于向傅雷强调其为“戴罪之身”。傅雷之怒，不亦宜乎？

此后二人的交往便急遽减少了。1966年9月3日，傅雷夫妇自缢身亡。10月4日，楼适夷从女儿楼遂那里得知消息。在日记中，他留下了这样的话：“像傅雷这种人必然只有这条路，可谓得其所哉了。”1967年下半年，不知是否想到了故人，楼适夷集中阅读了一批傅雷译巴尔扎克小说。12月，他在傅雷1963年3月签赠他的《都尔的本堂神甫 比哀兰德》空白页上写下这样一段话：“闻傅雷夫妇自缢而死，虽二十多年前旧迹不能无所哀思，但其坚持反动立场，自绝人民，死亦无足惋惜。唯所译巴氏著作差可流传耳。”这段话与日记中的话，都不像是在压力下所写，所以应该都是真心话吧。



楼适夷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三日至八月十日的日记，由其编为《逸庐日课第一册》，题名《工作·生活·情绪》。

《读家书，想傅雷》

友谊之再续

1975年2月，楼适夷追忆去年游富阳台的情景，作旧体诗《游富台》。起首云：“达夫南游竟不归，傅雷有约亦尘埃。”这实为同傅达夫和傅雷两位老友。但对于那达夫，只有惋惜；对于傅雷，则包含着许多遗憾。其心曲在他公开发表的1985年9月13日日记中表达得最为明白：“后来有过幻想，假如傅雷不去参加那些座谈会，如约跑到杭州，不顾一切地去玩玩钓台、桐君之胜，可能他后来的命运会变成另外一种样子。”(《访富阳 怀达夫》)

1977年，回到人文社的楼适夷着手推动傅雷译作的重新问世。1978年，人文社连出三部傅雷译作。不仅如此，楼适夷还积极撰写回忆文章。12月19日，他动笔写《怀念傅雷》，至次年2月16日方完成，题目也改为《痛念傅雷》，加强了情感浓度。19日，又改题《痛悼傅雷》。3月25日，他又写出一篇《傅雷的性格》。

1979年4月26日，楼适夷前往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参加傅雷追悼会。在追悼会上，他对傅雷留下“很好印象”。大概在追悼会后不久，楼适夷从傅聪处了解到，傅雷有一批家书留存。此时的楼适夷，一定马上想到了1957年在傅雷家中写信，并与傅雷联床夜话的场景。他于是产生将这批家书出版，以告慰故人的念头。但楼适夷清楚出版的难度，于是在4月16日致信出版家范用，向他简介到香港出版——香港三联书店若不合适，其他商业出版社也可以。这应该是《傅雷家书》正式步入出版筹划之始。范用对这批家书产生了很大兴趣，决定努力将其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。1980年11月，范用邀楼适夷作序。楼适夷表示“待看了校样再定”，并推荐由钱锺书来写。次年年初，《傅雷家书》排出校样，范用再邀楼适夷作序。2月11日，楼适夷复信说，读了校样后很感动，但书中所谈大都与音乐有关，“读不懂，感到这序文很难写。”并再次推荐由钱锺书执笔。范用不愿放弃，便改口让他写一篇介绍文章。楼适夷于是写出《读家书，想傅雷》。范用拿到稿子后，在标题后写下“代序”二字。

楼适夷在文中深情追忆了与傅雷交往的诸多细节，对《傅雷家书》则如此评价：“这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修养读物，这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、呕心沥血的教子篇。”作为资深出版人，楼适夷当然知道这本最敏感的要害是傅聪，所以他在其过往经历做了许多辩护，赞扬了他的爱国之息相关。对傅雷严苛的子女教育理念，楼适夷坦承不能认同，但肯定了其效果及傅雷“高度负责的精神与心力”。文末，他升华主题。该文既有生动的生活细节，又有独立的个人判断，且兼顾情感与时势，作为序言，再合适不过。

转眼到了1993年秋，89岁的楼适夷已经很难自如活动，卧室也被改造成了“家庭病房”。傅雷的表侄周琦，作为《长寿》杂志的特约通讯员，来请教长寿秘诀。楼适夷援引傅雷的做法，要求他必须住到自己家中。于是，周琦在楼家住了12天。楼适夷的话匣子一开，滔滔讲述的便是傅雷、聂绀弩等老友的故事。据周琦记述：“忆及悲慨处，黯然神伤；谈到欢悦时，仰天长笑；谈及阴暗时，更是深恶痛绝。”(《访著名“左联”作家楼适夷》，《长寿》1994年7期)

楼适夷勇于动情的率真性情，确实与傅雷颇有相通之处。傅雷出生时大哭不止、声音洪亮，于是得名雷，字怒安(取“圣人一怒而天下安”之意)，没想到名字成为人生的写照。楼适夷晚年特别喜爱龚定庵的《己仟心一首》，并将它写给王元化、金康政等友人。其首联为：“佛言劫火遇皆销，何物千年怒若潮。”不知楼适夷在多次书写这句诗的时候，是否想到过老友怒安？又不知“若潮”之“怒”，能“安天下”否？

张广海



齐白石《世世和平》。中国展览交流中心藏



齐白石《清平福来》。北京画院藏

齐白石笔下的“福”文化

在至今仍保留的中国传统节日中，春节可说是最重要的一个。人们在春节来临时，都要在家里大门上贴“福”字，这寄寓着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新年的最美好祝福。《尚书·洪范》说：“五福一曰寿，二曰富，三曰康宁，四曰攸好德，五曰考终命。”我国传统的福文化，包含了“长寿、富裕、健康、品德高、得善终”等五个维度的丰富内涵。

齐白石作为“人民艺术家”，他的艺术创作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，对于人们喜闻乐见的传统福文化，也有着丰富而卓越的表现。

“逆袭”人生 堪称福寿样本

齐白石的一生，堪称福寿双全的样本，福文化的典型代表。首先是得享高寿。据《白石老人自述》，齐白石生于清朝同治二年(癸亥)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(公历1864年1月1日)，1957年9月16日去世，享年足93岁(自署97岁)。齐白石不但得享高寿，而且身体健康状况良好，生命质量颇高。他一生极少因病入院治疗，60多岁时尚能每年在北京与湘潭之间来回奔波；1936年，年逾七旬的他从北京先乘火车、后搭长江轮船，去了一趟成都；1946年，他又以82岁高龄乘飞机到南京、上海。这样的长途跋涉涉很多年轻人都不吃不消，在白石老人那里却不但于身体毫无妨碍，而且不影响他每天作画刻印的习惯，每到一地都有大量诗书画印作品问世。据齐白石第五子齐良已回忆，齐白石在1957年去世前不久还能挥毫作画。

中国人以儿孙满堂为福，齐白石子孙众多，到1957年齐白石去世之前，齐家早已是五世同堂。齐白石幼年家境十分贫寒，他只在8岁那年读过半年私塾，就因家贫而辍学。十多岁学做雕花木匠、画匠，都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。齐白石终身不做官、不经商，纯粹靠卖画刻印收入，逐步过上了殷实富足的生活。无论环境如何动荡更替，终其一生，白石老人未受到大的冲击，他凭借过人的艺术造诣，最终获得“人民艺术家”至高荣誉，被授予“国际和平奖”，成为世界公认的艺术巨匠。

吉祥作品 传递融融暖意

齐白石一生中，创作了包括木雕、绘画、书法、篆刻在内的大量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传统福文化主题作品。他偏爱这一类主题，与他的人生经历也有很大关系。齐白石最早开始画画，就是从吉祥题材入手的。据《白石老人自述》记载，齐白石(当时名叫纯芝，为行文方便，都称作齐白石)8岁入私塾，在描红(写字)之余，自己学着画起画来。他有一个同学的姑娘生了个孩子。当地风俗，新产妇家的房门上，照例挂一幅雷公神像，据说是镇压妖魔鬼怪用的。这种神像画的笔意很粗糙，是乡里的画匠，用朱笔在黄表纸上画的。齐白石用一张包过东西的薄纸，覆在画像上面，用笔勾勒了出来。画好了一看，和原像简直是一般无二。从此齐白石对于画画，产生了莫大的兴趣。

齐白石在走上职业画师道路之前，做过一段时间雕花木匠。据《白石老人自述》，那时雕花匠所雕的人物，无非是些麒麟送子、状元及第等吉祥祝福类图案。湘潭齐白石纪念馆收藏着齐白石早年制作的一件雕花木箱，此木箱的两个挡板分别雕刻“状元及第”和“吉祥如意”四图，也属福文化范畴。

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，齐白石的艺术声誉如日中天。他这样一个寿登耄耋、“福寿双全”的艺术家，本身就是其创作的福文化作品最有说服力的宣传广告。齐白石一生创作数千幅，其中福文化主题画作(又称吉祥画)占相当大的比例。尤其是在他年届八十以后，吉祥画的产量更是大增。

吉祥画并非齐白石首创，民间早已有之。齐白石的独特之处在于用文人画大写意的手法表现吉祥主题，实现了雅俗共赏。同时，齐白石以“无物不可入画”的指导思想，极大地拓展了吉祥画的主题取材范围。

传统吉祥画有三种方式传递“画外音”：一是从物象自身特点衍生出来的寓意，如松、鹤、龟对应长寿，葡萄、石榴对应多子；二是运用物象的人格化内涵，如牡丹指代富贵，蟠桃指代长寿；三是谐音梗，如葫芦谐音“福禄”、

蝙蝠谐音“福”，鹿谐音“禄”，猴谐音“侯”，四个柿子谐音“事事如意”等等。相对来说，前两种手法比较委婉，更受传统文人画青睐；后一种更为直白，通常面对普通大众。

民间画师出身、后来跻身文人阶层的齐白石，对这些手法可谓得心应手，齐白石还结合受画人的需求与自己的理解，将这些传递“画外音”的手法，尤其是其中的谐音梗，大大地拓展了范围。比如，在创作于1893年、同样是为恩师胡沁园所作的《梅花天竹白头翁》中，齐白石画了两只栖息于枝头的白头翁，用白头翁名字中的“白头”二字，寄寓夫妻恩爱、“白头也成双”的良好祝愿。1896年绘制的《三公百寿图》，是为恩师胡沁园五十大寿所作，图中画了三只公鸡、一棵柏树，谐音位极人臣的“三公”(一般指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)和百年高寿。类似的还有《大利》(约1950年，北京市文物公司)，以一篮荔枝(荔谐音利)寓意“大获其利”。

别出心裁 融合“文人”“民间”

齐白石有些吉祥画中传递的意象十分出人意料。比如1950年绘制的《螃蟹》图，画面中有五只螃蟹，题款：“大悲先生治麻木，亦可横行。画此赠之。九十月白。”这是用螃蟹的行进方式即“横行”，来寓意受画人大悲先生的医术无人能及，借此表达赞美与祝福。

1927年绘制的《发财图》，画面上只有一个算盘。题款：“发财图。丁卯五月初，有客至，自言求余画发财图。余曰：发财门路太多，如何是好？曰：烦君姑妄言着。余曰：欲图越元帅否？曰：非也。余又曰：欲图印玺冠之冠类耶？曰：非也。余又曰：刀枪绳索之类耶？曰：非也，算盘如何？余曰：善哉，欲人钱财而不施危险，乃仁具耳。余一挥而就，并记之。时客去后，余再画此幅，藏之篋底。三百石印富翁又题原记。三百石印富翁制于燕。”以算盘入画不一定是齐白石的首创，但是专门画一个算盘以传递“发财”意象，似乎在齐白石之前尚无先例。

1951年绘制的《加官图》，画面中有两只盛开的鸡冠花和一只带有大鸡冠的公鸡，用“冠”谐音“官”，三个“冠”表示“官位连升三级”之意。北京画院所藏的一幅早年款《大富贵且寿》，画的是一块巨石，石上有一只绶带鸟，石侧有一株牡丹花正在开放。牡丹寓意富贵；绶带鸟的“绶”字则谐音“寿”，绶带鸟在高处，寓意“高寿”；石头也有长寿的寓意。

在北京画院收藏的一幅《清平福来》上，齐白石画了一个老者手托青色瓷瓶，望着空中飞来的一只蝙蝠。青瓶谐音“清平”，即社会安定、人民富足；蝙蝠谐音“福”。

齐白石就是通过娴熟地运用这类福文化“密码”，使得一幅幅以传统文人画笔意绘制的花鸟画、人物画、山水画，冲破旧知识分子自我欣赏的小圈子，走进了千家万户寻常百姓家。除了画作，齐白石在书法、篆刻方面也有十分精深的造诣，并以书法、篆刻形式创作了大量吉祥寓意作品。中国美术馆收藏着一幅齐白石《三余图》，题款：“画者，工之余；诗者，睡之余；寿者，劫之余。此白石之三余也。白石。”“寿者，劫之余”是自嘲，也是形象写照。齐白石一生可谓颠沛流离，到晚年才迎来和平安泰的时代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齐白石将家国思想融入传统福文化，创作了画作《世世和平》《和平》、书法《人和见太平》《已卜余年见太平》《愿天下人人长寿》等大量以祝愿世界和平、国家繁荣昌盛为主题的福文化作品，富有强烈的时代色彩，使传统福文化艺术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
张德斌